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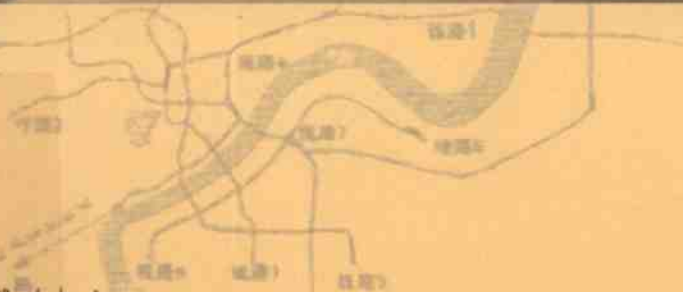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民国浙江华侨史

MINGUO ZHEJIANG HUAQIAOSHI

徐鹤森 著



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民国浙江华侨史

MINGUO ZHEJIANG HUAQIAOSHI

徐鹤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浙江华侨史 / 徐鹤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5004 - 7636 - 8

I. 民… II. 徐… III. 华侨 - 历史 - 浙江省 - 民国
IV. D693.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831 号

出版策划 宫京蕾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曦

成员：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荣 林吕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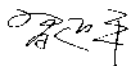
郑仓元 童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先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

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

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

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and 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

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 10 余个系列 400 余项研究课题，完成 230 项课题研究，出版 200 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 年 6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

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前 言

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南部，面对东海，海岸线长达 2200 多公里，还拥有宁波、舟山、海门（今称椒江）等优良港口，为浙江民众的对外交往提供了良好的便利条件。从历史上看，浙江人民出海闯荡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秦始皇时代，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就是在今天浙江慈溪市达蓬山的秦渡庵起程的。两汉时期，今天的宁波、温州等地与朝鲜、日本和南洋诸岛就有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一些浙江籍人士前往日本等国，日本人所称的“归化人”中，就有不少是浙江籍人士。隋唐时期，随着南方地区的逐渐得到开发，浙江的经济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今天的宁波成为当时我国东部地区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来自日本的遣唐使多在这里登陆，而中国的赴日使节也从这里起程，唐代著名佛学大师鉴真和尚就是从浙江省的舟山出发前往日本的。两宋时期，朝廷在今杭州、宁波两港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当时全国共有四个对外贸易的港口，除浙江省的两个以外，另外两个是广东省的广州港和福建省的泉州港。可见，在对外交往和贸易方面，浙江省一度在全国还是领先的，对外的交往和贸易也延伸到南亚、西亚等地。南宋时期，由于定都杭州，出于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又增设今天的温州、海盐为外贸口岸，使浙江省成为对外交往和贸易口岸最多的省份。元

朝时期，在浙江省设立的对外贸易口岸有今天的宁波、海盐、杭州、温州四处，当时全国一共只有七处，可见当时浙江省的对外交往和贸易仍然处于全国的前列。1296年，浙江永嘉人周达观随元朝使节离开今天的宁波前往真腊（今柬埔寨一带）时，在真腊发现了不少同乡人，说明早在元代，就有许多浙江人移居东南亚各地。同时，元代的海外贸易活动范围也更大更广了。明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和贸易活动更为频繁。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在离浙江不远的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的，经郑和七次远航，中国到南洋谋生者日益众多，其中应该也有浙江省的居民。明代后期仍实行海禁政策，但还是保留宁波港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清初一度实行严厉的海禁，但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随即开放海禁，设广州、宁波等四口岸，正式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浙江省仍然保留有对外交往的通道。鸦片战争以后，浙江省的宁波、温州、杭州先后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可见，作为东南沿海的浙江省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和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浙江人也一直是具有冒险传统的华侨的重要祖籍地。

二

当然，中国大规模地对外移民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还有不间断的战争，使众多百姓的生存状况严重恶化，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海外去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以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为例，从1661年至1812年这150年间，福建的人口增加了9倍，而耕地仅增加32%，每人平均占有耕地数从7.11亩减为0.9亩；同一时期内，广东的人口增加20倍，耕地仅增加

27%，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从 25 亩减为 1.67 亩。^①更可恨的是土地还集中在一小撮富人手中，而腐败的清政府则对广大贫苦农民征收极其繁苛的租税，进行各种强制性的剥削，使底层民众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得不移居海外，寻找活路。而当时西方各国的殖民主义者，也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因为当时最主要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已于 1807 年和 1838 年先后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使新近夺得的各殖民地的劳动力供应更加紧张了，契约华工成为最佳的替代对象，所以他们不惜跑到遥远的东方，争相贩卖华工，用以接替得到解放的黑奴。这些华工大多是以“猪仔”的身份，被塞进拥挤不堪的底舱，同运猪一样被运往世界各地，他们的命运，可以说比那些黑奴还要悲惨。黑奴还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并不希望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而那些契约华工名义上还是自由人，只是欠了主人一点路费，需要用劳动来偿还，因此对他们的死活，那些殖民主义者并不真正关心。华工们的这种地位，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低下的身份和来到国外后的悲惨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对外移民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血缘关系的民族，因此，移居海外的华侨，也常常按地缘、族缘关系结集。近代以来，不但殖民主义者把大批同一地区的华工贩往同一个国家或地区，还有许多人以自由人的身份移居国外，他们往往听从先出去的亲属、同乡的介绍而移往同一地点。因此，许多同宗、同乡的华侨往往聚集在同一地区，成为华侨在海外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在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多系闽南籍，柬埔寨、泰

^① 陈达：《中国移民》（Da Chen, *Chinese Migration*），华盛顿 1923 年版，第 5 页。

国的华侨多系广东潮州籍，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多系粤闽籍，美洲的华侨多系粤籍；只有西欧各国是浙江籍华侨相对集中的地方。

从总体上看，海外华侨主要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各省，其中尤以广东、福建两省为最多。据估算，20世纪80年代末，在海外的约3000万华侨中，广东籍的约有2000万，占总数的66.6%；福建籍的约有700万，占总数的23.3%；广西籍的有200万，占总数的6.6%；海南籍的有185万，占总数的6.16%。浙江省是上述四省之后的第五华侨大省，到1998年前后，浙江籍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总人数已超过100万人。除去占总数1/3的港澳同胞，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的总人数约为80万人（758917人）^①，约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2.5%左右。另据《浙江统一战线年鉴2006》提供的资料，到2005年前后，浙江省的海外侨胞人数已达104万人，不包括港、澳、台胞人数^②。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海外华侨华人的总数约为3975万^③，可见，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浙江籍华侨华人占华侨华人总数的比例大约是2.6%左右。另据估计，到1949年，海外华侨的人数达到1000多万^④，如果浙江籍华侨在华侨总人数中的比例不变，那么1949年浙江籍华侨的人数应在25万—26万之间。但实际上，据笔者的估计，很可能达不到这个数字。我的依据是，尽管缺乏浙江省各个时期各个

① 吴潮：《浙江籍海外人士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编：《浙江统一战线年鉴2006》，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页。

③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华侨华人概说》，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④ 同上书，第10页。

地区华侨华人人数的统计资料（许多地区有现有的华侨华人的统计数字，但没有民国时期华侨人数的统计数字），但从已有的部分资料来看，1949年以前，浙江省的华侨人数还是比较少的。如浙江南部的文成县，是有数字统计的少数县之一，该县1949年前的老华侨总人数为1312人，而改革开放以后，从1985年到1998年，在这14年间，共有53540人移居海外，到2000年，全县共有华侨6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分布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①是1949年前老华侨总数的51倍以上。另外，浙江南部著名侨乡青田县，1949年前即有民众不断向外移民，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青田县的华侨总数已达18万人^②，但1949年前老华侨人数是多少，却无统计数字。根据一些老侨胞提供的信息，分析综合起来，20世纪20—30年代，旅居西欧的青田侨胞的人数大致如下：法国3000多人；德国2000人左右；荷兰1000多人；奥地利1000人；意大利1000人；比利时300多人；西班牙300多人；葡萄牙200多人；其他如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瑞士都是几十人或几百人，总数在1万人左右，不包括东欧地区。^③另据归侨陈里特先生估计，青田县华侨人数最多的年份是1925年，那一年，共有25500名青田华侨旅居在欧洲各国。^④而据吴潮先生的研究，1949年前，青田在日本的华侨人

① 朱礼主编：《文成华侨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86页。

② 周望森、吴潮：“三百年历史 十八万华侨”，载《在海外的青田人》，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③ 陈彬：“旅居欧洲青田侨胞经过情况”，载政协浙江青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田文史资料》（华侨专辑），1995年2月，第6—7页。

④ 陈里特：“青田人出国到欧洲的经过”，载政协浙江青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田文史资料》（华侨专辑），1995年2月，第5页。